

红山文化猪龙形玉器分析

江伊莉

远在公元前 3500 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辉煌的玉器雕琢艺术。公元前 4500~3000 年，该文化集中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省西部和河北省北部。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考古学家乌居龙藏、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对红山后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红山文化由此得名。20 世纪 70 年代，对同类遗址进行发掘有了前所未有的发现——制作成龙形和云形的玉器。这些玉器被发现于几个主要遗址的墓穴中或室外祭祀场的表面上。从风格上来看，他们都是技术成熟制作精美的艺术品。就其象征意义来说，令人联想到他们与一起发现的建造精致的祭祀中心以及另一种独特的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女性的泥塑生殖塑像艺术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玉器的造型，特别是被考古学家们称之为“猪龙”的一类，显得非常重要。作为阐述这些玉器在中国远古早期文化背景下的特殊地位的一种方法，作者将先行根据玉器的形状、风格以及对其考古的来龙去脉进行分类。

从地理上来看，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在肥沃的西辽河上游地区。根据商朝、西周和东周时代青铜器的考古发现以及汉代在此建立辽西郡，该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是人们所熟悉的地方。傅斯年曾经假定说这个地区在夏朝之前和商朝时代曾经是属于夷族各部的一个早期聚居区。然而，在考古遗存中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一关联。因此毋宁说红山聚居区似乎与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密切相连，而且可能与傅斯年确定为夏或是与由饶宗颐所提出称为胡的其他早期历史部落集团相关联。

某些两种文化共有的陶器形态和彩绘图案基本上表明了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当红山文化被首次发掘时，考古学家们依照河南中部和北部地区的仰韶文化类似的彩陶把红山早期文化称之为“彩陶阶段”。孙守道和郭大顺最近详细阐述了这一关系，提出曾先后存在两个与后岗仰韶文化以及后来的龙山文化相关联的制陶阶段。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¹⁴C 年代测定几乎都集中于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对辽宁东山嘴一处遗址测定年代为 5485 ± 110 年，校定为公元前 3490 ± 80 年，对牛河梁 3 处遗址的测定年代为

公元前 3020±80 年, 3625±110 年和 3630±110 年。发掘者对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进行测定, 年代为公元前 2600 年之前, 正处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后岗阶段范围内。

一 依形状、风格和材质划分红山玉器

从红山文化墓葬和祭祀中心出土的玉器分为佩饰和挂饰。每件玉器上通常有一个或多个小孔, 或在顶部打成贯穿孔, 或在后部打成横贯孔。玉器的主要形状包括所谓的“猪龙”及相关的形象, 马蹄箍形器, 称之为“勾云形”的玉器, 猫头鹰形和有装饰孔的玉环。也出土了带有装柄孔和不带装柄孔的斧形玉器。还有带有贯穿佩戴孔的较稀有的玉器形状, 蝉形玉器和龟形玉器。其他佩饰的形状包括玉镯, 各种玉珠, 一个长的笔形的玉器, 一个锥形吊挂和一个带有佩孔的三联玉环。小巧的锥形吊挂、玉镯和玉珠是属于中国东北海岸地区和中南地区分别称之为大汶口、崧泽和河姆渡文化墓葬中普遍的形状。而从另一方面看, 前面所列的玉器形状成为红山文化特有的特征。

这些土生土长的红山玉器中最突出的是所谓的“猪龙”形象。这个名称源于玉器的脸部特征和弯曲的身体的特征, 脸部使人联想到野猪 (boar, 发掘者使用了 pig 一词), 弯曲的身体使人联想到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面部五官无一遗漏。全部表现在两个拳头大小, 高 15 厘米左右的玉石上。它出土于辽宁建平县, 雕刻的玉器侧面是大大的 U 形耳朵, 雕成两层或三层褶皱, 全都是围在圆圆的瞳孔或眼窝周围。在头顶, 这两只耳朵以斜面上升, 分为两峰。脸孔的剩余部分限于猪吻的刻画上, 吻上有两个像泪珠形状的鼻孔, 猪口张开, 两边对称地刻画出一口上下弯曲交错的獠牙。C 形躯体着重加粗, 柔软地蜷曲起来, 尾部刻成与猪吻平行的平面, 为雕刻出这个 C 形管状躯体, 中间刻出了一个圆孔, 头部正下方与弯曲的身躯结合处又按规矩由两边向中间钻出一个小贯孔。这一形状不会和河姆渡、崧泽以及良渚文化中当做耳饰的玉玦制作艺术相混淆。这种割裂分离方式——并非一直是完全的割裂——确定这个暗示为胎儿式的躯体头部和尾部两个平面结束处。它的额头处常常用许多弧形线来描绘, 而猪吻突出成为截短的外延。这个玉器形状就是想表现出一个圆形物体, 因为它的前后边、上下边都被磨制过。在牛河梁 M4 墓葬中发掘出了两个玉猪龙, 在中国出版的出版物中还确定了其他十几件同类玉器。已知在中国之外的巴黎, 纽约罗伯特·埃尔斯沃思收藏馆, 和伦敦艺术协会也还有其他收藏品。除了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之外, 上面所提到的玉龙的共同特征是具有标准的面部五官。如果制作时面部简化, 某些标志特征如獠牙、鼻梁上的前额皱纹、鼻孔、有时表现耳朵围绕眼睛的褶皱就可能被省略, 眼睛却从不省略。精心刻制的作为特征标志的多层褶皱环绕着圆眼睛, 然后继续延伸到耳朵直到猪吻之上。这一

特征应用于新石器时代并出现在后来的商朝时期的造型上。这些“猪龙”大小从4~15厘米不等。

和“猪龙”造型有关的玉器包括从三星他拉出土的21厘米长的大型“猪龙”以及东山嘴出土的弧形“猪龙”。前者与猪龙大小不同，身体弯曲但不是胖胖的胎儿蜷曲形态，头部造型为长头侧影而非厚重的正面像，眼睛造型是杏核眼而不是圆眼。尽管有争议说三星他拉出土的龙首与“猪龙”的相似处是都有鼻孔，并且嘴都是张着的，但是猪吻和口的位置及刻画方式不同。三星他拉出土的龙的头上有羽状物，而各种猪龙是环形大耳朵。弧形玉器的龙首和三星他拉出土的玉器的龙首之间的相似之处表明在制造猪龙形状时期，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制作也很普遍。

用自然主义手法表现的猪首装饰在另一出土于三官甸子长8.9厘米的小型玉器的两端。猪首圆圆胖胖的，不像东山嘴出土的相关的弧形造型以及三星他拉玉龙那样在结构上拉长。然而这三种造型都有带着鼻孔的吻，微微张开的嘴，侧面斜上挑的眼睛，这些类型上的相似之处表明猪以及猪的野生祖先——野猪——是红山文化时期产生制造龙形玉器头部造型灵感的基础。

另一类红山文化玉器可能是猪龙抽象象征的一般参照像。但是这种划分只是一种尝试而不是确定的。这一类玉器的代表是在内蒙古那斯台发现的2.2厘米宽的小型玉猪脸；而欧文·哈里斯先生的收藏品种以及牛河梁的发掘品代表更为复杂的演绎。这类制作既简单又精致的变体的共同点是圆眼睛和用獠牙强调的长嘴巴。因此以哈里斯收藏的那件长17厘米玉器作为这类玉器的实例，可以用来进行详细研究。哈里斯收藏的玉器与那斯台出土的简洁的玉环不一样，它以精湛的工艺做成复杂的形状，侧边是成对的弯成柔和弧形的钩状，反面打磨过但是没有雕刻其他装饰。

从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的第二大具有特色的玉器类型是被发掘者称为“勾云形”镂空图案的玉器。这类玉器大小各异，有的长度为24厘米，例如发掘于三官甸子的玉器，有的长度为7.9厘米，例如，发掘于胡头沟的玉器（但是这件玉器已经破损，因此不完整）。这类玉器根据它透雕盘旋（云形）命名，玉器的四个角呈现微微向外伸展的等距离弧形状。在玉器顶端有2个或3个贯孔，或是在饰物经过打磨但是没有装饰图案的背面的平面上有拴绳用的对穿孔。颇具特色的波浪形状强调了视觉美感，它使人联想到翻滚的云彩。这种物体已经被命名为“勾云形”。用来刻画猪龙眼部皱褶或是刻画动物脸孔勾形的圆润的沟槽，也明确地表现了云彩中部气流的盘旋和确定了四个弧形的周边。这类给人留下感官印象的典型玉器公开发表了7件。出土于巴林右旗的一件变体的边缘有7个勾形，它比通常标准的四个勾形多出了三个。在某些变体的中央处可以看出鸟头的外部轮廓。因为该类玉器设计为附属饰品，其出土时位于尸体头骨下面，因

此这类饰品被称之为头饰。

红山文化全部遗存中最不同寻常的第三类玉器是“马蹄形箍形器”。这类玉器的特征是无底筒状，如把玉器倒转，外形有如马蹄，置于地面上形成45度斜面。形成45度角的斜口边缘处与相对的另外平口边缘相比较薄，平口边缘和玉箍器筒壁其他部分同宽，较薄且锋利的斜边显得有些破损，而相对的平口处有相对的贯穿孔。因为这类玉器艺术品均出土于所发掘的墓葬中，水平地放置于墓室骷髅头下，所以这类玉器被描述为瓷枕的锥形。其他学者认为其功能是束发器。萨克勒收藏的一件玉器和分别藏于布法罗科学博物馆和哈佛大学格伦维尔·温什诺普的收藏品中的两件相似的玉器却与众不同，这些箍形器的斜边边缘和筒壁同厚，温什诺普收藏中的玉箍形器的两个边缘厚度相同的斜边上装饰着一个U形花纹图案，图案反复延伸，好似模仿同时代所制陶筒形器上的彩绘图案。

第四类红山玉器的形状是小型挂饰，通常不足5厘米宽。正面刻有图案，反面是带眼的挂钩。一类最普遍的变种是鸟形挂件，有时被称之为“鸮”，当地人又称为“猫头鹰”。在东山嘴发现了一件绿松石挂饰。这类玉器标准的样式是有着突出的头部，像猫一样的耳朵，尖下颌，没有装饰的鸟体轮廓由张开的羽翼构成，雕刻的细条纹显示出羽翼、脚爪和尾巴下边的羽毛。根据从胡头沟和巴林右旗出土的玉器中，其变体标志了简练地雕刻鸟头、羽毛和形状细节的倾向。那斯台出土的一件玉器清晰地刻画了鸟爪。其他小型的玉挂件，例如乌龟、侧面鱼形象及蚕蛹在形象制作时均出现了或简洁或细致的变化。

红山玉器的第五类是中间有一个大孔和一对佩戴贯孔的略呈方形或圆形的玉璧。除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外，据了解，还有其他收藏品。每件玉璧的通常外径为10~12厘米、内径为5~7厘米，越往中间中孔或外部边缘处就越薄。尽管一位作者把这种形状归类为钺——战斧的象征，但是并不存在这种进化的范例。在器体上部的两个贯孔表明了这类玉器和红山文化其他玉器一样是为了悬挂而设计的，还有斧形玉器，为长方形，长13.5、宽5.8厘米。斧刃处为椭圆形，上有安装斧柄的贯孔。

所有红山玉器中的第六种类是玉镯、玉珠，有两个或三个大孔的饰品，凿形挂饰和笔形长玉棒，其中一件长达29厘米。

红山玉一贯被称为软玉，理论上来说，此玉和新石器文化时期较南地区浙江、江苏各省的软玉相同。从技术上来说，它被划为岫岩玉，一种绿色的具有蛇状花纹的玉石，又被称之为透蛇纹石。就岫岩玉的物理化学特性方面来说接近于昆仑玉，有时昆仑玉也被称为蛇纹玉石，是由于它由纤蛇纹和板蛇纹构成。玉石的颜色有淡绿色、湖绿色、斑驳黑、鸡骨白、黄色和棕色。近似的颜色可以像斑点一样混杂在玉石中。从硬度

上相比较，软玉和翡翠的硬度为莫氏硬度6~7，而岫岩玉的莫氏硬度在5.5~6之间，软玉的比重为2.9~3.4之间，岫岩玉的比重比软玉低，为2.5~2.7。像其他玉器一样，红山玉器也是使用研磨料和旋转工具，经过打磨、切割、钻孔和抛光制成。

红山玉器的风格象征着对于富有含义的雕塑形式的尊重和物质方面的显赫。玉器的边缘处有条理地磨成弧形，对玉面进行细致的抛光以产生温润细腻的光泽。羽毛或者是用柔和的凸起线条或用勾槽描绘出其外形，形成波浪状图案，或用非常浅的精致的凹线描绘出动物的獠牙或口鼻处皱褶。小型玉器表现羽毛的线条可能很粗糙，但这种特征是由于玉件的太小所限。有时玉器显现出旋转加工的痕迹。如出现在一些箍形玉器的内部，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中，尽管玉器是具有坚硬无比的顽石特征，在处理玉时，似乎是在用柔软、韧性很强的陶具来造型。某些玉器，例如猪龙形和箍形玉器突出了三维立体，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雕塑形态而非两维的平面图案。红山玉器的风格可确定为即是自然主义的又是概念化的。

二 红山玉器：随葬礼仪及内涵

红山文化玉器的重要意义部分的可以通过其被发现时的来龙去脉来理解。在祭坛基址上和祭坛附近或在墓葬中发掘出的玉器主要是源自四个遗址，包括辽宁省喀左和凌源县的三官甸子、胡头沟、东山嘴和牛河梁。在东山嘴发掘出的置于方形石台基址上的玉器的形状为小型鸟状和双龙首形，以及从未公开发表的蚕蛹形，和置于附近毗连的圆形祭坛之上的裸体陶制无头怀孕女性躯体。

在东山嘴的两个户外祭坛是一个精心制作的结构的一部分，周围环墙还有用精心加工的石头构建的基址。长方形祭坛为长11.8、宽9.5米，而圆形祭坛直径是2.5米。两个祭坛都是用夯实的黄土作地面，周围的框架由加工成表面平滑的0.2~0.3米长的白灰岩或砂黄色花岗岩贴面，在圆形祭坛东南方发掘出的呈坐姿的小型（高5.8厘米）和半人高矮的（高18、宽22厘米）两个孕妇像，令人很敏感地感受到塑像凸起的腹部、臀部和大腿。在户外祭坛上发现的这些女性塑像和玉器强调了它们特殊的礼仪功能。

在上层人物的墓葬中也通常能发现玉器，最先在胡头沟发现的石棺墓和石墓墙类型与最近在河北边界附近辽宁建平县和凌源县接壤处的牛河梁遗址发掘出的类型相关联。牛河梁的坟墓，又称为“积石冢”，与另外两个相关的大规模发现有着多方面而又复杂的联系，一个称之为“女神庙”而另一个是有三道中心石墙组成的建筑，牛河梁发现于1981年，1983~1985年进行发掘。尽管遗址分布广泛，覆盖面积达1.2平方公里，

有7个地点。只发表了牛1号和2号的初掘报告。牛2号遗址包括了大型的墓地和层层叠起的圆形祭坛，牛1号遗址是“女神庙”。

牛1号遗址所在的山顶位于大型平台的南端。“女神庙”遗址东面围着一段墙，墙外边堆满了彩陶筒形器。其布局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标为JIB的多功能房屋基址，经测量，宽6.9、长18.4米，另一个标为JIA，是一个较小单人间基址，一半位于地下，宽2.65、长6米。尽管可以提供出的测量数据很少，也无多功能房屋的结构平面图，但还可以了解到房基是石头构成，墙是用木头框架搭成，再用泥垛了两三层，屋顶铺上茅草。地面和墙壁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烧烤。尽管没有图片，但根据描写，JIB的布局由一个中央主要房间组成，有一次它被描绘为圆形。它位于北面侧翼一个长方形小房间旁边，在东边，附近有一条通往一个墙壁打磨光亮的椭圆形房间的小径。在主厅中，发现了装有绿松石眼睛彩绘陶制人头、肩膀、上肢、手和胸部残片，此外还有形状为“猪龙”头的动物残片及猪脚和非常多的陶器。在北屋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鸟爪残片和红陶筒形器残片。用紫红黄白各种颜色绘在墙上的壁画残留显示了抽象设计的装饰性“浮雕花边”和刻画成行的点状图案。因为中央大厅的建筑结构已经倒塌，假定为浮雕式的陶塑只剩下零星碎片。某些物体碎片直接涉及和玉器造型相关的状况，像“猪龙”的头部、猪蹄和卷鼻子。獠牙又被描绘为犬齿以及这类造型的唇部都一目了然，据报道该龙形的猪蹄出土于猪龙上体的下面。

和真人头颅等大的女性头像高22.5、宽16.5厘米，或者从左耳到右耳的宽度为23.5厘米，发现于女神庙遗址的中央大厅，这颗著名的头像在类别上属于中国北方人种。头像上有连着颈部的双肩部分和前胸部分，这证明该头像是一个原来完整的女性塑像的一个部分。因为头像后部是平的，并发现有一个木头支撑物附在其上，因此假定此塑像和“猪龙”一样，曾经装饰过庙宇的墙壁。其他人体塑像遗存，大部分是呈跪姿或盘膝而坐的女性，显然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规格。例如，据描写，在女神庙主厅发现的一只耳朵和鼻子残片应属于真人3倍大小的女性塑像。发现者们推论说这些自然主义造型形态属于6尊至少4种规格的女性塑像：小型，原人三分之一大小，原人大小和原人三倍大小。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一个中空的陶制上臂中发现了数块人骨。身体部分被雕塑成中空的，

牛河梁的发掘者们还报告了四组积石冢Z1和Z2，位于牛2号遗址女神庙正北方。经确定，这个地区（Z3）的设计也是史无前例的——用淡红色的花岗岩建成叠成三层的圆形祭坛，初步计算表明三个同心圆的直径分别为22、15.6米和11米。Z2中有一座大型墓（M1），在地平面上覆盖着石头砌成的长方形平台，周围有石墙，最大距离从东到西为17.5米，从南到北为18.7米。根据描述内墙分别位于距离棺室5.9、7.5米

和 8 米处，没有冢；像胡头沟的墓葬一样，3.6 米长的石砌平台非常平坦。大型墓葬 M1 的地下中心部分为 2.21 米长，0.85 米宽，0.5 米深。令人感兴趣的是胡头沟 M1 宽为 5.7 米，位于地下深达 4.5 米处，是围圈墓。就此墓情况来看，该墓不是长方形而是用彩绘陶制筒形器围成圆形。和胡头沟的墓一样，牛河梁 M1 棺室由多层加工成长方形的石块层层砌成。该墓被盗掘过，因此没有出土所期待的玉器。在胡头沟墓葬中，葬品全部是玉器，形状有龟、鸮、勾云形器、环和镯。值得注意的是没有陪葬陶器和工具。牛河梁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猪骨和牛骨。这种在地下深处埋葬大型动物，上面建筑精心设计的祭坛，周围垒石墙，显然属于首领的权力范围，有如胡头沟墓中的死者，他要求大规模的、精心设计的崇拜。

Z1 中一组较小的积石冢位于大型墓葬 M1 和圆形祭坛的西面。类似于 M1 的结构，这些墓葬由内外石墙分界组成一个大的长方形区域，在这组墓葬中，有一个用彩陶无底筒形器隔开的双人墓。这些墓穴与一半置于地下，一半凸出地面，再在其上堆积石块形成冢的独石坑墓不同。这些墓葬中的一些是合葬墓，意思是一堵石墙由各墓共用，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在一个石墓中有三副骨架。还没有关于墓主性别的报告。有些墓葬被再次打开后又重新埋葬，例如 M7 的状况。M1~M9 被学者引用过，但是并未体现在遗址发现图上。只有 5 个墓葬 M4、M6、M7、M11 和 M15 已有公开报告。后一组墓葬中发掘的玉器体现出其典型的形状，“猪龙”、“箍形器”、玦、“勾云形”、环和镯。所有这些陪葬藏品与那些已知定为胡头沟和红山后的玉器在结构类型上相似。

三 红山玉龙的意义

在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大型中心墓地和祭坛的综合建筑明显的集中在生殖神灵和强大的人类灵魂崇拜上。玉器在祭祀遗址被发现这一事实强烈地表明了他们的功能是相关的宗教象征。这是 1983 年 7 月参加在东山嘴遗址专题讨论会的学者们的一致共识。史前文化的著名学者苏秉琦和其他 11 位学者在《文物》1984 年第 11 期发表了他们的观点。作品提出的主要问题关系到祭坛的宗教功能，玉器和陶制塑像的发现和遗址的年代。正如几位作者注意到的那样，东山嘴遗址的使用不仅仅只是一个阶段，然而在最后的使用期间有了一个方形和一个圆形两个祭坛。以所发现的灰黑色陶器为基础确定了其晚期和仰韶文化后期、早期龙山文化为同一时期。

学者们的观点一致，认为东山嘴是礼仪中心，还认为此处祭坛用来崇拜被尊为生殖神祇的地母。可能它后来代表了“后土”或“至上大地之母”所含的文学意义。“后”是在晚商卜辞中用来称呼女性，通常是皇后的一个称谓。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者孙守道和

郭大顺更进一步提出强调对生殖女神的崇拜，像牛河梁遗存所体现的那样，与祖先崇拜相关联，在该崇拜中，生殖女神意味着具有神秘色彩的祖先。辅助神灵，例如，龙，意味着是她的助理，而且也确是如此，他们也具有生殖象征的功能。

孙守道还强调说“猪龙”体现了神秘的中国龙的早期形状，他还说龙的早期形状和猪相似可能与早期定居农业需要农业丰产、家庭兴旺相关。由于几种原因这一象征地位的确是很具说服力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猪骨，更可能是野猪骨是最普遍的动物遗存。在新石器晚期其他重要玉石加工文化中猪也作为一个重要的题材出现。对于早期北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中国人来说，猪，在这种情况下是野猪，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它的进化反应了探索制服并驯化野生动物的革命。学者注意到在古典文学和汉代艺术中，野猪的后来文学意义是雷雨之神的象征，称之为豨韦。这非常贴切。在早期的历史时期中，它们表明了其对于野猪和多产之间联系的持续兴趣。当然从后期的文学意义上来说，人所共知的龙既是多产的象征又是到达超自然天上的交通工具。龙的早期文学意义是作为供雨者，多产的源泉以及永久善行的象征，同时，有了与生殖女性塑像同时发现的红山文化玉龙相关的考古证据，极有力的强化了红山文化龙型最初是多产的象征的代表这一见解。

某些艺术史资料以及后来的文学数据也证实了红山文化玉器代表着传统的龙的生殖象征这一论点。为确定厚厚的胎儿状C形玉器就是传统的中国龙，孙守道根据编年史各个阶段从红山时代到夏家店/龙山（公元前2500~前1800年）二里头（公元前2100~前1800年）以及商代（公元前1800~前1100年），追溯它的类型变化。尽管可用来进行比较的发掘实物有限，但向商代过渡时期的实物很具启发性。一件里面绘有团龙图案的彩陶，在陶寺遗址出现，陶寺是目前划归为龙山文化的一个遗址，可能属夏王朝早期，公元前2200年。盘中用黑色和白色细致描绘的一条龙盘绕在经过抛光的盘内壁上，仿佛预示着在后来青铜礼仪器皿中该图案的流行，画出的龙的身体装饰有鳞状图案，龙的头部的特征是口张开，伸出分叉的舌头。尽管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作品具有明显不同的制作工具，但是躯体盘绕，直到将尾尖盘到头上的蛇身的外形构图作为一个含义为龙的图案存留了漫长的年代看来好像意味深长。发掘自甘肃武山，陕西宝鸡和甘肃甘谷的描绘在仰韶文化后期陶器上尚存的几个龙的早期图案在设计上都是相似的圆形，他们的出现令人联想到这类图就其在古代中国北方的普遍性来说要比一般性的认识更为普遍。

在商朝艺术作品中，尽管三星他拉出土的变形在设计上更大众化和富于变化，红山文化中已经出现了两种传统玉龙的变形。后者具有代表性的实例是盘绕在一个商代铜盘内壁上的龙。商代特征在角、耳朵形状和身体制作的变化方面显而易见。在西部地

区一个墓地的墓葬中以及从安阳5号墓葬发掘出的几件实物也非常鲜明地代表了晚商艺术中的猪龙形状。已知其他在国外的藏品保存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和阿瑟·M·塞克勒美术馆。这一类型在气质上易于辨认：一个略呈方形的头附着在粗壮蜷曲的身体上。把这些玉器定为商代是其躯体设计成漩涡形图案，还有在雕刻上不那么强调具有色情色彩的粗厚裸体躯干雕像的重要性。曾经特别精心刻画得面部现在简化了，而且头部几乎和躯体齐平。

除了具有启发性的考古发现和艺术史数据，还有某些文字资料似乎密切了红山文化玉器和中国传统龙形的相互联系。在晚商时期的卜辞中有两个用来代表龙的字。一般说来，它们与红山文化玉器两个类型图案非常一致。第二类变体改写成汉语中已知的“龙”字。第一类变体被改写为虬。根据汉代字典《说文解字》，龙没有角。尽管在卜辞中后者的语义功能的意义是“复原”，其“qiu”的读音明显的把它划为变体“无角龙”。让我们跨越时间，从没有文字的红山时代到拥有文字的商代，目睹了两种不同形状龙的不同特征的延续：一个标志着红山文化玉器的形状和另一个后期商代玉器形状的不同特征。来自商代卜辞的文字资料很多，而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然而象形文字变体和艺术图像的相同看来好像具有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其所暗含的此种共同点基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意义。可能红山文化是商代在确立中国北方历史传统作出贡献的传统文化之一。

红山文化的玉器丰富多彩变化万千，各自具有其风格和表现手法。它们看来好像以象征的形式直接与重心集中于生育和繁殖的中心墓地相连接。其象征性图案，特别是龙，很特殊，这不仅是因为观念，而且也因为与中国古代早期神话中的龙相联系。发掘还在进行，因此我们的结论只是尝试性的，在此领域中的进一步工作很值得一做，希望发现更多关于史前红山文化对于中国主流传统的贡献。

(作者单位：美国学术社会基金会)

(王波然译，刘国祥校)